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1.422

“托出南洋的多种颜色”

——从老舍《小坡的生日》看新加坡多民族社会

刘梓琳¹ 徐明月² 罗鸿海^{1,*}

(¹韶关学院, 广东 韶关 512005; ²广西民族大学,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 530000)

摘要: 作为老舍的东南亚主题小说,《小坡的生日》在面世之初就得到较多关注。关于《小坡的生日》中“民族”主题的讨论,自21世纪初就有海内外不同领域的学者参与其中。《小坡的生日》涉及华人、印度人、马来人与“阿剌伯人”四个族群,折射出近代新加坡的多元民族社群景观。本文结合不同族群相关研究与基本史实,以此思考中国文学中“文”“史”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 老舍;《小坡的生日》;新加坡;多民族社群;中国文学

自1924年夏,老舍开启了长达5年有余的“留英任教”经历。期间,他写下《二马》等优秀的长篇小说。启程返华时,老舍因故在新加坡滞留。为维持生计,其在新加坡一所华侨学校教授“国文”(中文),历时半年。在短暂的教学阶段中,老舍接触到不同民族的新加坡儿童,以此为题材写下《小坡的生日》。“小坡”在小说中是一名普通儿童,实际指的是新加坡。

《小坡的生日》最初连载于1931年的《小说月报》第1~4号。至1934年5月,上海生活书店发行《小坡的生日》合集本,并在同年6月于《时事新报》进行报道、宣传,称它“托出南洋的多种颜色”。^[1]至1937年5月,《小坡的生日》已翻印四版。

《小坡的生日》面世后,在社会上引起一些点评。1935年,署名“朴园”的时评人在《清华周刊》发表“书报评介”,对《小坡的生日》作四个总结:“字句的灵活”“尽情地采纳方言”“给一个明晰的图画”和“有着轻快讽刺的描写”,认为《小坡的生日》是献给“人”的童话。^[2]1946年,郑家瑗在《申报》撰文《读〈小坡的生日〉》,对小说的结构、内容和相关的读后感进行整理、展示。^[3]

随着老舍的其他作品陆续面世并流行,有关《小坡的生日》的讨论暂告一段落,直到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儿童文学”意识的兴起,作为中文儿童文学代表作之一的《小坡的生日》也得到相关学者的重视。而新加坡作为一个“多民族社会”,其背后折射的“多民族”元素也备受关注。

一、研究回顾

1985年,张宗顺撰文《浅谈〈小坡的生日〉的儿童情趣》,不仅梳理了《小坡的生日》的形成背景、主要内容和文本特色,还从“儿童情趣”的视角切入这部小说。在论文结尾,他引用老舍在《谈风》中的文章《有了小孩以后》的片段“小孩是科仑布,把人带到新大陆去。这个新大陆并不很远,就在熟悉的街道上和家里”^①,以此总结、论证“儿童情趣”在教育研究中的重要性^{[4](P89)}。在过往的“教育”体系中,老一

项目情况: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一般项目“《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马来文版)”(项目号:23WZSB029)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1] 第一作者:刘梓琳(1994—),韶关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

[2] 第二作者:徐明月(1989—),广西民族大学东南亚语言文化学院马来语系讲师,历史学博士;

[3] 通讯作者:罗鸿海(1990—),韶关学院副科级辅导员,澳门城市大学教育学博士。

^① 该片段原文来源:老舍,《有了小孩以后》,载《谈风》1936年第3期。

辈教育家虽立足马卡连柯、苏霍姆林斯基等苏联教育家的理论对少年儿童的教育有所思考，但关注儿童自身“情趣”（情感、趣味需求）的意识尚浅。因此，在学术研究初步恢复之际，张宗顺一文可谓是同时恢复学界对“儿童”与“文学”两方面主题相结合的传统。

至千禧年前后，学者对其讨论扩展至儿童文学之外的领域。曾广灿从文学接受的角度考察老舍研究在日本和南洋的不同处境。提及“南洋”视角时，他特意提到新加坡学者王润华^[5](P 192-194)，因为王润华对《小坡的生日》的一些评述为 21 世纪有关其“后殖民”问题的争论奠定了理论基础。^[6](P 37-50)

千禧年前后的研究者对《小坡的生日》的关注重点在以下两方面：第一是有关“后殖民”问题的争论，第二是老舍文学中的“南洋书写”。第一个问题其实来源于 20 世纪后半叶各国兴起的“反殖民”学术思潮，例如英国南亚裔理论家齐亚乌丁·萨达尔曾批判奈保尔、拉什迪等同为外籍南亚裔文学家的“棕色撒哈布”^①现象，因为后者严重依赖欧美语境中，对“同族”社会评述过于刻薄^[7](P 136-144)。这些学者绝大多数既具有“第三世界”背景，同时亦有长期生活在欧美发达国家的经历，他们对于欧美语境下的“霸权”逐步挤占“第三世界”的舆论空间异常警惕，由此发起“后殖民”（Postcolonialism）讨论，在“舆论不对等”的守势中尽可能坚持为“第三世界”发声。由此可见，这种争论既属于文学论题，也属于历史论题。

朱崇科与罗克凌之间的论争是这一研究热点在中文圈的体现。朱崇科撰文《后殖民老舍：洞见或偏执？——以〈二马〉和〈小坡的生日〉为中心》，以老舍海外主题的小说《二马》和《小坡的生日》为主视角，结合诸多海外学者的研究与论述，从“后殖民”的角度既肯定老舍作为“华人”、“少数民族作家”的身份对西方文字霸权的颠覆，又提出老舍作为“他者”对主流“身份认同”的追求很可能也陷入“文化殖民”的陷阱，并阐明他这个观点正是承续东南亚华裔学者王润华早年的分析^[8](P 14-15)。对此，罗克凌提出了反驳意见，认为朱崇科的批评受到了“新加坡本位”的学术观点的影响，老舍文本深陷“文化殖民”是一种有待斟酌且偏颇的误读^[9](P 143)。

学术界对老舍《小坡的生日》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表层的“儿童文学”到“异域写作”探微与“后殖民”论争相结合，可见学术界对这部儿童小说的关注深度在增加。《小坡的生日》涉及四个族群：华人、印度人、马来人与“阿剌伯人”（阿拉伯人），笔者认为，虽然三者着墨看似“寥寥”，却折射出近代新加坡的多元民族社群景观，值得展开分析。

二、老舍笔下的新加坡各族形象

（一）华人：适彼“叻”土的小坡同族

1819 年，新加坡开埠。在英属海峡殖民地秩序下，大量聚居马六甲、槟榔屿等地的华人、印度人劳工来到新加坡。由于华人沿袭马来语“石叻”（Selat）称呼这个新开埠的英属殖民地，因此他们也把“新加坡”称为“叻”，而相应中文语境下的“叻”往往也指代新加坡华人社区^[10](P 2)。

历经多年发展，这些具备一定人口规模的新加坡华人涉足社会、经济与教育多方面，成为新加坡第一大族群。虽然新加坡历届领导人都反复强调新加坡是一个多民族社会，并不是某一个民族“一家独大”，李显龙也在讲话中同时切换英语、马来语和华语^②，但自新加坡开埠以来，华人文化一直是当地的“主流”（或者说在各民族中所占比重最大），这个是可以肯定的。

“哥哥是父亲在大坡开国货店时生的，所以叫作大坡。小坡自己呢，是父亲的铺子移到小坡后生的……”^[11](P 21)《小坡的生日》展示出小坡的“华人”身份：父亲是一个在新加坡开设“国货店”的华人老板。老舍自己曾在“国文”学校教书，他视野下的“国”显然指的是中国。

虽然家中所有的文化取向都指向“华人”，但新加坡常年以来多民族混合聚居的情况使得小坡对于自己的族属有一定的“疑惑”，见载第二部分“种族问题”：“小坡弄不清楚：他到底是福建人，是广东人，是印度人，是马来人，是白种人，还是日本人。在最近，他从上列的人种表中把日本人钩抹了去，因为近来新加坡人人喊着打倒日本，抵制仇货；父亲——因为开着国货店——喊得特别厉害，一提起日本来，他的脖子便气得比虾蟆的还粗。”^[11](P 24)

^① 笔者注：“撒哈布”一词来源于 Sahib，原是南亚人对贵族的尊称，例如末代马拉塔执政官（佩什瓦）拉纳·撒哈布（Nana Sahib，1824-1857）。在英属印度时代，这个称谓被南亚本地人用来问候殖民者长官。

^② 参见央视网：《新加坡总理喝一口水换一种语言 中英马来语自由切换》，哔哩哔哩，2020 年 4 月 22 日，<https://b23.tv/rxmMnII>

虽然小坡自己对于“种族问题”的概念颇为模糊，但他的“疑惑”进一步证实他身上的“华人”社群特征：第一，下南洋的东南亚华侨普遍存在以地域划分社群的现象，并以“会馆”作为自己原籍认同的空间，例如“潮州会馆”“南海会馆”“福建会馆”“海南会馆”等等。这些冠以原籍（闽、粤、潮、琼）的团体对新加坡华人社会保持着长时间的影响，处于“求同存异”的状态^[12](P 106)。小坡的父母在他面前经常展示对“广东人”的不同评价，导致他自己时而觉得自己可能是“广东人”，时而又觉得不是，时而觉得自己可能是“上海来的马来人”（很显然他对马来人的感知是非常混乱的）。这种混杂的认知，恰恰形成新加坡华人的一个历史结构基础：从“多元”到“一体”，在“一体”中也能映衬“多元”。

第二，小坡一家对日本的敌对态度也很明显地展示出其华人身份。虽然老舍发表《小坡的生日》之初，中日两国尚未全面开战（《小说月报》第四期出版于1931年4月），但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已久，荼毒中国台湾和东三省多年，大多数华人对日寇自然有痛恨之情。作为南洋“国货店”的老板，小坡父亲是众多华人商贾“抵制日货”的一员，可见家国情怀延伸到新加坡华人社会的方方面面。老舍提笔写《小坡的生日》之时，新加坡已有较为激烈的“抵制日货”活动。单单是1929年，从华人社团给白三春茶庄发警告信，到《叻报》报道新加坡的“抵制日货”情绪比中国内地还强烈，皆可看出华人社会的抗日情绪萌芽^[13](P 709-710)。

小坡等人就读的“国文”学校，是新加坡华人社群重视教育的一个缩影。华人从运行百年的“萃英书院”（1854~1954），到教授中英文的新式学院，一直很重视社群内部的教育问题，为东南亚华语文史奠定了重要基础。老舍短暂的“南洋经历”能留下《小坡的生日》这样一部能有近90年讨论史的“异域想象”著作，可以说华人开设的“国文”学校是很好的平台。

（二）印度人：殖民地秩序下的“劳工”

“看门守夜的印度有多么尊严好看！头上裹着大白布包头，下面一张黑红的大脸，挂满长长的胡子，高鼻子，深眼睛，看着真是又体面又有福气。”^[11](P 23)小坡曾跟他的小伙伴说他想成为两个典型的“非华人”角色：“看门的印度”和“马来巡警”。这就是王润华、朱崇科对老舍文笔肯定之处的来源：老舍试图打破西方话语体系下的“等级差异”，从“据小坡看”这种“第三方视角”引入到新加坡的多民族社会。

上文小坡看到的印度人形象，是英属海峡殖民地印度裔移民的一个群体——旁遮普锡克教徒（Punjab Sikh），他们在新加坡、马来亚等原海峡殖民地以军警行业为主。

海峡殖民地各地都有不同族裔的印度裔群体，例如南印度移民泰米尔人（Tamil），主业军警的北印度移民旁遮普锡克教徒，来自印度西海岸的古吉拉特商贾（Gujaratis）等等。因此，学者 Vineeta Sinha 对新加坡印度裔移民进行进一步细分，认为不能简单用“印度教”（Hinduism）指代整个“印度裔”（Hindu），因为旁遮普锡克教徒、穆斯林商人和欧亚混血基督徒在其中比重不低^[14](P 139-160)。

除了锡克教徒，小坡也提到了印度教活动——他把主持印度教节日的婆罗门僧侣称为“和尚”，也折射出华人对“他者”的认知。《小坡的生日》第八部分“逃学”中，小坡等人看到一群穿着五颜六色衣服的印度人打着鼓、吹着喇叭聚众游行，里面有带着黑帽和“蓝法衣”的老少“和尚”（婆罗门），架势像“大开路鬼”，最后还有“半死的小男孩”。^[15](P 281-284)这个仪式很贴近印度教的“大宝森节”，对于小坡而言，他可能从看似“狰狞”的细节中误以为这是有“和尚”作法的“葬礼”。

（三）马来人：“班达诃罗”的遗民

马来族群与新加坡之间的渊源可追溯到“新加普拉”（Singapura），随着“新加普拉”王公领被满者伯夷帝国（Majapahit）占领，原王公拜里米苏拉（Parameswara）带着部众来到马六甲，建立马六甲苏丹国^[16](P 152-154)。他与他的儿子被一些文献记作“依斯干达沙”（Iskandar Syah）。1699年开始，随着马六甲苏丹王族嫡系绝嗣，有拜里米苏拉家族女系血统的“班达诃罗”（Bendahara）^①家族成为新的苏丹家族，他们同时统治马来亚南部、苏门答腊东北部和两地间岛屿，统治版图被称为“柔佛帝国”。但这个“帝国”徒有其名，到后期严重受制于荷、英两大殖民体系。

随着柔佛苏丹家族内讧不断，“班达诃罗”家族庶流分出“天猛公”家族（世袭这一爵位而得名），本

^① 笔者注：“班达诃罗”（Bendahara）是马来传统官职，意即“首相”，与“沙班达尔”（Shahbandar，又译作“彭古鲁”Penghulu Bendahari）、“天猛公”（Temenggung）、“拉克萨马纳”（Laksamana）并列为马来苏丹体系下的文武重臣。参见芭芭拉·沃森·安达娅、伦纳德·安达娅著，黄秋迪译：《马来西亚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6月，第54页。

家也因苏丹王储分别支持英、荷殖民者出现分化。1819年,“天猛公”阿卜杜勒·拉赫曼(Abdul Rahman, 1775~1825)在英国授意下废黜原苏丹,改立其同父异母兄长侯赛因沙(Hussin Syah, 1776~1835),但侯赛因终其一生的居住地就在新加坡^{[17](P 399)},柔佛的实际控制权落到阿卜杜勒·拉赫曼、敦·易卜拉欣(Tun Ibrahim, 1810~1862)和阿布巴克尔(Abu-Bakr, 1830~1895)祖孙三代手上。至1868年,“班达诃罗”家族领袖把“摩诃罗阁”(Maharaja)这一古老的头衔转交给阿布巴克尔,至此侯赛因沙的子孙彻底失去苏丹头衔和相应的继承权,滞留在新加坡的“甘榜格南”(Kampong Glam)街区,这个社区正是新加坡马来居民聚居的一个核心区域。

马来人在新加坡定居历史颇久,甚至在英国完全控制海峡殖民地之前是这一地区商贸活动的主导力量。但随着侯赛因沙的后人被迫寄寓此处,以及大量华裔和印度裔的劳工随英国殖民体系迁居至此,马来人在新加坡地位大幅度下降,其“文字”书写长期处于“失语”和“边缘化”状态。虽然新加坡马来人出过开国总统尤索夫·宾·伊萨克(Yusof Bin Ishak)、前任总统哈莉玛·雅各布(Halimah Yacob)等政要,但社群整体经济水平和社会地位偏低。

回归《小坡的生日》正文中。老舍提到关于马来的文字细节有:“马来巡警”^{[11](P 24)}、小坡等人族群认知的独特想法“东街的小孩儿们全有马来父亲,咱们的父亲也一定是马来人”^{[11](P 27)}、跟小坡说“坐过牛车”的两个“马来小妞”^{[11](P 36)}、马来人卖“红毛丹”水果(在此之前小坡听长辈说“马来人是很懒的”)^{[15](P 288)}等。在第六部分“上学”一栏提到小坡作为华人孩子视野下的马来形象:

“两个马来小姑娘的上学方法就又不同了:她们的是个马来学校。她们是每天午前十一点钟总上学,而且到了学校,见过先生便再回家。听说:她们的学校里不是先生教学生,是学生教先生。她们所担任的课程是‘吃饭’。到十一点钟,她们要不到学校去,给先生们去主意吃什么饭,先生们便无论如何想不出主意来,非一直饿到晚上不可!她们到了学校,见了先生,只要说:‘今天是咖咧饭和炒青菜’。说着,便向先生一鞠躬。先生赶紧把这个菜单写到黑板上。等他写完,她们便再一鞠躬,然后手拉手儿回家去。”而当小坡表达想去“马来学校”时,他父亲出于一种偏见“不准小坡去”^{[11](P 41-42)}。

这段文字是全文对“马来人”描述最为详实的部分,里面其实折射出华人儿童视野下的马来日常:马来小姑娘去的“马来学校”很可能是教授马来语和“爪夷文”(Jawi,阿拉伯字母的马来文字)的学校,当时新加坡、槟榔屿和邦咯有这类学校,但主要是马来人学习,少数华人求学者是原籍三亚的回族华侨“广东人”(Orang Kwangtung)。女性学生很可能在学习期间兼职煮食,“咖咧饭”(咖喱饭)和“炒青菜”是马来人最日常的饮食。

通过这段,读者不难看出虽然小坡兄弟曾有把父亲当作“上海来的马来人”的类似想法,但很显然他们的父亲对马来人是有偏见的。对于这一点,结合上部分《小坡的生日》笔下的“小印度”,笔者认为这一“偏见”是新加坡社会在殖民体系下被引导出来的对马来人和印度人等“非中非西”族群的“认知”,但并不是老舍主观意识中的“歧视”,老舍甚至起到第三方“客观展示”的作用。齐亚乌丁·萨达尔非常直接指出,殖民主义不公正舆论系统使得马来人往往被描述为“懒惰的”族群^{[7](P 100)}。

(四)“阿刺伯人”:横跨南洋诸岛的阿拉伯裔商人社群

在老舍1931年发表在《小说月报》的版本中,除了华人、印度人、马来人,另外一个有一定出现频率的族群便是“阿刺伯人”,包括小坡在街市上所见到的“阿刺伯的买卖人”^{[11](P 25)}、在第十四节“猴王”中提到张秃子的帽子很像“新加坡的阿刺伯人戴的小红盔儿”^{[18](P 449)}。在当代《小坡的生日》版本中,“阿刺伯人”被统一写为“阿拉伯人”^{[19](P 148)}。

这些在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做生意的阿拉伯人往往有一个代称——“哈德拉米人”(Hadramis),他们得名于也门南部的哈德拉毛地区(Hadhramaut),自古就有跨域贸易的传统。参与“郑和下西洋”的职官马欢曾对这些阿拉伯商贾的一个据点“阿丹”(今亚丁)有过描述:“(阿丹国)又有市肆、混堂,并熟食、丝帛、书籍、诸色什物铺店皆有。”^{[20](P 64)}由此可见,商业文化一直是也门(或阿拉伯半岛南部)沿海历史书写的主旋律。

18世纪初期,也门哈德拉毛本地乌斯马尼部族(Othman)年轻人萨益霍·阿都卡迪尔(Shaikh Abdul Kadir)辞别故乡,前往苏门答腊东部。阿都卡迪尔在此担任老师,与妻子育有四个孩子:长子穆罕默德·易卜拉

欣(Mohammed Ibrahim)定居马六甲,次子穆罕默德·迪沙(Mohammed Desa)定居安汶,三子努尔·穆罕默德(Nur Mohammed)定居实打龙,幼子斋纳·阿比丁(Zain Abidin)定居三宝壟^{[21](P 3-4)}。这段经历被马来亚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阿都拉·蒙西(Abdullah ibn Abdul Kadir Munsyi, 1796—1854)记录下来,这位后世被马来西亚誉为“近代马来文学之父”的学者,其血缘跟种族概念上的“马来”几乎没有关系:在苏门答腊担任经师的南也门移民阿都卡迪尔,就是他的曾祖父。

而新加坡也有阿拉伯人贸易的记录,并为此形成一些小型“聚居区”。但他们相较于马来群岛其他区域的影响力明显小很多,没有出现阿都拉·蒙西这类对区域历史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在《小坡的生日》所涉及的四个族群中,阿拉伯人像是“过客”的角色。

有意思的细节是,《小坡的生日》里提到张秃子的“小红盔儿”。这个“小红盔儿”其实并不是阿拉伯人的专属,而是整个中东地区都流行的“菲兹帽”(Fez)。这种帽子随着奥斯曼影响力的推广影响到整个中东,最终一些迁居东南亚的“哈德拉米人”也戴上此帽子以示身份。

三、结语:中国南洋文学中的“文”与“史”

虽然《小坡的生日》从头到尾的主旨都是“童话”,老舍在新加坡暂居的半年也难以让他做到比肩郁达夫、王任叔等常年驻守南洋的文学家对东南亚民族文化的书写深度,甚至“南洋”在老舍一生的书写中占比甚低,但这部以“南洋”为主题的长篇小说,却折射出许多非常有意思的族群议题。在后世的研究、论争中,各学科学者突破其原有的“儿童文学”、“纪实文学”的地位,从其“细枝末节”中探寻老舍自己都未必意识到的相关话题——“南洋想象”与“民族形象”,可见《小坡的生日》之文本魅力。而笔者则通过结合不同族群相关研究与基本史实,逐一分析其“形象”与“阶层”背后的历史背景,从而思考中国南洋主题文学中“文”与“史”之间的关系。

(一)以“文”促“史”:作为历史研究启蒙者的文学工作者

老舍本人并没有直接成为“历史学家”这一角色,但与他同为文学工作者的王任叔(巴人)却通过长年累月对马来群岛相关史料的阅读,结合在当地进行“参与式观察”(田野)的经历,为后世中文东南亚研究提供了一系列经典著作——《印度尼西亚之歌》、《印尼散记》、《五祖庙》、《印度尼西亚革命观感》、《印尼社会发展概观》、《印度尼西亚古代史》和《印度尼西亚近代史》^{[22](P 52-56)},其中王任叔生前未出版的《印度尼西亚近代史》由周南京在1995年重新整理并出版。

如果是中文视野下的印度尼西亚研究,学术界通常会关注王任叔与萨努西·巴尼(Sanusi Pane)笔下的“印度尼西亚史”,而萨努西·巴尼的知名身份是印尼左翼文学家。在职业研究东南亚历史的群体形成之前,“打破殖民霸权话语”成为东南亚各族文化人面对的首要任务。王任叔为常年驻守印尼的华人,而萨努西·巴尼为印尼人,两人都有多年联合印尼各族人民与荷兰殖民者、日本入侵者等反动势力斗争的经历,因此对于当地历史的重视程度是可以想象的。

在史料相对匮乏(一方面是殖民者的有意破坏,另一方面是本地史料缺乏的客观因素)的大前提下,“文学”记载虽未必“真实”,在比对与考证过程中其背后的“主观性”对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和社会背景有一定的挑战,但如果能从“只言片语”中发现与时代相吻合的资料,从而进一步完善相关叙事,也不失为促进历史研究、改进对“人物思想”认知的一种举措。

(二)以“史”证“文”:史料比对、考据过程中的文学思考

对于《小坡的生日》进行相关的东南亚“民族”研究,不仅仅要关注具体的“中文写作”视野下的“南洋民族社群”,同时,在逐一解读其对应族群背后展现的文化符号(例如衣着、职业)的过程中,也要思考文学书写背后的历史背景与社会结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历史背景、社会结构就是属于这些定居新加坡不同民族的“经济基础”,而他们在老舍笔下的“形象”则属于中文视野下的“上层建筑”——老舍让读者能比较表面地认知到新加坡不仅仅有华人移民和英国殖民者,同时也有印度裔、马来人和阿拉伯人这些具有多元文化的族群。

(三)文学书写中的“多元包容”认知

王润华曾在评述《小坡的生日》的文尾对老舍的“预言”给予正面评述:“老舍虽然在新加坡的中学和街边观察了只有半年,他却看出很多小孩像小坡,会成长成为新加坡多元种族国家的好领袖。”^{[6](P 48-49)}新加

坡民族、语言和宗教信仰众多，在其独立前后，本地从官绅到市民都极其重视“族群和谐”，将其视为“新加坡”共同体的一个基础。

新加坡南亚裔穆斯林曾建设带有“苏非主义”(Sufism)色彩的“纳格尔圣陵”(Nagore, 词源是印度泰米尔纳德邦一个小镇)，这个公共空间不仅仅容纳穆斯林进行“圣纪”等宗教活动，同时也接纳大量信仰印度教、华人民间信仰的印度人和华人移民。在1857年某次大型庆祝活动中，华工与印度劳工甚至联手与英国殖民警察发生冲突，抗议殖民者的不仁管控^{[23](P 101-103)}。由此可见，新加坡不同民族很早就已经开始追求“求同存异”的多元包容社会形态。这种追求虽然常常会面对各种各样现实问题的困扰，但却是相关学者贯通“文”与“史”过程中更到位思考东南亚社会“多种颜色”的必经之路。

在实践相关中国南洋主题文学研究的过程中，研究者需立足“历史”，把“文学”与对应的时代背景、民族社群、社会风貌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对“多元包容”予以更为准确的认知。哪怕是寥寥数字的“只言片语”，研究者和读者也都要对此重视起来，因为这些容易被忽略的文字片段很可能才是文学萌生的根基与土壤。立足历史、关注社会，从人民的角度完善东南亚研究，是未来文史各领域研究者必须夯实的“基本功”。

参考文献：

- [1] 小坡的生日出版[N].时事新报,1934-6-11.
- [2] 朴园.书报评介：小坡的生日[N].清华周刊,1935(7/8).
- [3] 郑家瑗.读《小坡的生日》[N].申报,1946-7-4.
- [4] 张宗顺.浅谈《小坡的生日》的儿童情趣[J].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汉文版）,1985(1).
- [5] 曾广灿.老舍研究在日本和南洋[J].社会科学战线,1996(6).
- [6] 王润华.华文后殖民文学——中国、东南亚的个案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
- [7] (英)齐亚乌丁·萨达尔著.东方主义[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马雪峰 苏敏译,2005.
- [8] 朱崇科.后殖民老舍：洞见或偏执？——以《二马》和《小坡的生日》为中心[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
- [9] 罗克凌.后殖民误读：老舍《小坡的生日》新释[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
- [10] 汪鲸.适彼叻土：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新加坡华人族群[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
- [11] 老舍.小坡的生日（1-6）[N].小说月报,1931(22-1).
- [12] 柯木林主编.新加坡华人通史（上）[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
- [13] 柯木林主编.新加坡华人通史（下）[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
- [14] Vineeta Sinha.Unpacking the Labels “Hindu” and “Hinduism” in Singapore[J].Southeast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1997(25-2).
- [15] 老舍.小坡的生日（7-10）[N].小说月报,1931(22-2).
- [16] John Miksic.Singapore and the Silk Road of the Sea, 1300–1800[M].Singapore: NUS Press,2013.
- [17] (英)理查德·温斯泰德.马来亚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姚梓良译,1974.年9月,第399页。
- [18] 老舍.小坡的生日（11-14）[N].小说月报,1931(22-3).
- [19] 老舍.小坡的生日[M].北京:海豚出版社,2017.
- [20] 马欢著.冯承钧校.瀛涯胜览校注[M].北京:华文出版社,2019.年1月,第64页。
- [21] (马来亚)阿都拉·蒙西.阿都拉传[M].吉隆坡:热带出版社,1998.年7月,第3~4页。
- [22] 周南京.关于巴人的印尼历史著作[J].东南亚纵横,1991(2).
- [23] (印度)苏尼尔·阿姆瑞斯.横渡孟加拉湾：自然的暴怒和移民的财富[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0.

“Bringing Out the Various Colors of the Nanyang”

——Looking at Singapore Multiethnic Society from Lao She's *Xiaopo De Shengri*

Liu Zilin (Shaoguan University, China)

Xu Mingyue (Guangxi Minzu University, China)

Luo Honghai (Shaoguan University, China)

Abstract: As Lao She's Southeast Asian theme novel, *Xiaopo de shengri* (Xiao Po's Birthday) received more atten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its publication.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scholars from different fields have participated in the discussion of the "ethnic" theme in *Xiaopo de shengri*. *Xiaopo de shengri* involves four ethnic groups: Chinese, Indian, Malay, and "A La Bo" (阿剌伯, Arabian people), reflecting the multi-ethnic community landscape of modern Singapore. This article combines research and basic historical facts related to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to refl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i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Keywords: Lao She; *Xiaopo de shengri*; Singapore; Multiethnic society; Chinese literature